



辽金史

研究

都兴智 著

Liaojinshiyanjū



人民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研究

陈鹤琴 著



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

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关宏 张秀平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史研究/都兴智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01-004767-7

I.辽… II.都… III.中国-古代史-研究-辽金时代

IV.K24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036 号

辽金史研究

LIAO JIN SHI YAN JIU

都兴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河北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4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767-7 定价:25.00 元

前 言

本书是我二十多年来学习辽、金史，探索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劳动结晶。书中的内容多为最近几年才完成的研究成果，有一些成果虽然以前曾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过，但在收进本书时，又做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辽、金两朝的历史研究，历来被视为中国断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我之所以能接触到这一领域，并非偶然。二十多年前，我在吉林大学攻读东北地方史硕士研究生时，在恩师张博泉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个探讨有关金代科举制度的学位论文，之后就对金史产生了兴趣。由于辽、金两朝历史关系密切，后来又相继对辽史的某些课题做了探索，但主要还是涉及金史的内容较多，这在本书的具体篇章方面也有所反映。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只是客观地记录了我对辽、金史有关问题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和轨迹。关于辽金两代的历史，中外学者都先后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其成果亦颇可观。先哲云“学无止境”。我个人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至于辽金的基本文献史料，本来就不多，凡是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人，大

体上都熟悉。但如果有时候换一个视角去探讨问题，往往就会得到新的启发。令人可喜的是，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又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物资料、石刻文字资料及新的考古研究成果。本书中有些课题的研究就借助了这些新的资料和成果，因而得出新的结论和看法。由于个人学识水平有限，书中对许多具体问题虽然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和个人的看法，但可能还显得很不够成熟，论证不足和错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史学前辈和学界同仁的批评和指教。

我当年师从张博泉先生时，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曾告诫我们：要老老实实先读十年书，不要急着发表文章和出书。转眼之间离开他已经二十年了，我多么希望在自己出第一本辽金史专著的时候能够请他来为书稿作序，怎奈如今恩师已乘鹤西去，我又不愿追随当今流行的请名家作序之风，只好用自己拙笨的笔，写下上面的话，权作前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辽金教育和科举研究	1
第一节 金朝教育述论	1
第二节 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	12
第三节 金代科举榜次与状元(上)	21
第四节 金代科举榜次与状元(下)	36
第五节 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	56
第六节 金代科举与女真人	68
第七节 金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86
第二章 辽金文献政治军事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107
第一节 《大金国志》及其作者	107
第二节 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校勘举要	114
第三节 辽代勋爵制度及公主命妇封号等问题研究	122
第四节 金代官制的几个问题	138
第五节 金代女真人的军事制度和战术特点	146
第六节 金代女真人与佛教	156
第七节 田珏之狱略论	166
第八节 金初女真人与辽宋儒士	175

第三章 辽金历史地理研究	193
第一节 黄龙府始建开原说驳议	193
第二节 辽代铁州地理位置问题考辨	202
第三节 辽金的曷苏馆女真研究	209
第四节 金代马纪岭和几个猛安谋克地点的考订	220
第五节 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228
第四章 辽金契丹女真风俗习惯研究	235
第一节 辽代契丹人的姓氏和命名习俗	235
第二节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与研究	246
第三节 金代女真婚姻习俗研究	255
第四节 金代皇帝的“春水秋山”	264
第五章 辽金人物研究	278
第一节 辽秦德昌墓志及其生平研究	278
第二节 石重贵、石延煦墓志及石氏北迁问题研究	287
第三节 王庭筠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301
第四节 金哀宗略论	308
第五节 沦落金地的南宋使臣朱弁生平述议	318
参考书目	331
后 记	335

第一章

辽金教育和科举研究

第一节 金朝教育述论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教育概况，人们曾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迄今为止，论及金朝教育的著述却比较少见。本节拟就金朝教育类别、特点以及在封建社会教育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作粗浅论述。

一、学校教育

金朝的官办学校和唐、宋一样，基本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不同的是，就学校的民族性质来看，从上到下又分为汉儿和女真两套体系，兹分述如下：

（一）中央官学

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太学。金朝的中央学校始建于海陵王时期，天德三年（1151），在上京创设国子监，置国子学。养士二百人，其中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世宗大定六年，又设太学，初养士一百六十人，后增至四百

人。大定十三年，增设女真国子学，养士二百人，其中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大定二十八年建女真太学。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皆隶属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各一员，国子监丞二员，提控四学。祭酒、司业相当于近代国立大学的正、副校长，国子监丞相当于政治教导员。国子学和女真国子学各设博士两员、助教二员、教授四员。太学和女真太学均设博士、助教各四员。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相当于教务长兼教授。助教、教授是专职教员。

就四学的性质来看，国子学和女真国子学属于高级贵族子弟学校，学生来源有严格的规定：“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①；太学、女真太学则为中上层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混合组成的学校。四百名学生中有“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②。

就学生的出路来看，以国子生和女真国子生为优。凡三年不能充贡者，可通过学官考试，到尚书省所属政府各机关补任官职，然后按资迁转，终不失仕进之路。而太学生的出路则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不登“龙门”卒为白身，一般很少能得到任官机会。

中央除上述四学之外，司天台系籍学生七十六人，其中汉学生五十人，女真学生二十六人。设有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五科，置教授两员。学生“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③。另外还设有医学十科，隶属太医院，故中央素有六学之称。

（二）地方学校

金朝的地方学校有汉儿府、州、县学和女真府、州学。

地方汉儿学校是在北宋和辽旧有的基础上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金初，辽宋旧学多毁于兵火。太宗时，出于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在戎马倥偬之际设科举以取汉士，实为“借材异代”，仍未遑顾及教育。随着金朝统治的巩固，地方学校在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地方官员倡导和支持下得以重建，地方教育逐渐得到恢复。如赤盏晖，天会年间迁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宋州旧无学，“晖为营建校舍，督劝生徒，肆业者复其身，人劝趋之”^④；博州州学毁于宋季兵火，金初校舍为聊城县署所占，熙宗天眷年间，学正祁彪、学录尚戢、教授赵恝“以瞻学之资、郡人之私”重建^⑤；王寂之父王础皇统年间出任定州唐县县令，时县学久废，础“乃大新庙学，延集诸生，亲为指授”^⑥；天会十年状元胡砺，熙宗时出任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⑦；山西忻州州学在刺史傅慎微的努力下“完复于天德小康之际”^⑧；陕西京兆府府尹完颜胡女（即完颜活女）、同知韩希甫贞元三年奉朝廷之命，重建府学，“期年而成”^⑨。

世宗、章宗之世，教育得到空前发展。世宗时在中央增设太学，地方普遍设立了府、州、县学。大定十六年置府学十七处，养士千人，后增州学。至章宗时，府学增至二十四处，节镇州学三十九处，防御州学二十一处，养士凡一千八百人，这是金朝教育的全盛时期，加之各刺史州、县学的学生，总数将愈万人。府、节镇州、防御州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⑩，行政上派一名文职官员兼管学校教育。刺史州、县虽不设教授，但也各聘地方名儒为教员，由进士出身的州县长官或属官负责学校教育。

地方女真学之设始于太宗天会年间。太祖天辅三年，完颜希

尹制女真大字成，命颁行之。太宗天会元年，选诸路女真贵族儿童入学女真字，后选优秀者送上京，由女真字专家耶鲁亲自教授。时宗翰之弟宗宪、太师撻盭温敦思忠之侄兀带、世袭蒲华之子纥石烈良弼、完颜兀不喝、纳合椿年、温迪罕缔达等皆入选，这是金朝培养的第一批女真族知识分子。他们学成后，被派到各路任女真教授，为女真学的振兴和普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方女真学校的普遍设立是在世宗时期。大定四年设译经所，命以女真大小字译汉文经典。“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①。十三年，在举行首次女真进士考试、设立女真国子学的同时，又在有女真人居住的诸路设女真府、州学二十二处，以新科女真进士为教授。此后，女真进士科和汉进士科并行，直至金末，金朝的教育从上到下形成了女真和汉儿两套完整的体系。

（三）行政管理 and 教育经费

金代试补学生，中央学校由礼部主持，地方学校则由各级主管教育的官员主持，参加过府级以上科举考试的终场举人可免试。在校学生皆使用国子监统一印刷的“监本”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十七史。以太学为例，每季度最后一个月举行“私试”，考试成绩在前五名者直接报部。每十日休课一天，年节、病、事、省亲皆给假。违犯校规或不堪教化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罚直至开除学籍。金朝的教育经费主要是仰仗学田。章宗泰和元年（1201），更定贍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②。宣宗南渡后，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京师府学生每月只给通宝五十贯，学者日见其少。兴定五年，又定府州生员每人给田四十亩。政府对学生的经济待遇比较优惠，“学田、租税、物力

皆免”。“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⑬，以此来吸引学生投学。

二、宫廷教育和民间私学

(一) 宫廷教育

金朝的宫廷教育主要包括对皇室宗族子弟和侍卫亲军、宫女的文化教育。

金朝虽没有像北宋那样，为宗室子弟专设“宗学”，但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形势需要，也很注重向汉族士大夫学习，按照中原传统封建统治者的标准去培养接班人。占领辽地后，金在崇尚武力、不断扩大统治区域的同时，就注意对贵胄特别是完颜氏宗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女真人最早接触到的是汉字和契丹字，“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⑭。完颜希尹制女真大字，“设学校，使讹离刺等教之，其后学者渐盛”^⑮。后熙宗又制女真小字，女真人在学习女真大小字的同时，仍必须向辽、宋的汉族士大夫学习汉字，女真统治者指派专门的辽宋硕学之士来负责教育宗子。如江南名士朱弁，以奉使见留，曾被软禁在今山西大同善化寺达十四年之久。“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⑯；鄱阳洪皓，亦曾任完颜希尹的家庭教师，教授其八子及诸孙；熙宗自幼“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⑰；海陵王与其兄完颜充同师临潢汉士张用直。

熙宗即位，按照中原汉族皇帝传统的承袭制，立太子，设东宫官属，以老成硕学之士任之，“掌护卫东宫，导以德义”。宗室各亲王府设王傅一人、文学二人，“掌师范辅导”，“资广学问”^⑱，并定期对宗室子弟进行专门考试，检查他们的学业。“皇统元年，试宗室子做诗，永元（海陵兄之子）中格”^⑲。海陵篡

位后，主张“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②。因之又命张用直教授太子光英。世宗注重接班人的学问，同时也强调道德教育，认为“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东宫讲书或议论间当以孝俭德行正身之事告之”^③，先后选用刘彦宗之子仲海、文士刘頔、天眷二年状元石琚等任太子少师。对诸王傅也严格择选，世宗于诸子中尤爱重博学多才的豫王永成，以太学博士王彦潜（皇统九年状元）为王府文学，“永成师事之”。章宗为皇太孙，世宗先后命女真进士完颜匡、仆散讹可、司经徐孝美、“辽东夫子”王遵古、正隆五年进士路伯达等为侍读官。太常丞、名进士张暉曾兼任原王（章宗即位前封号）府文学。显宗子鄂王琮“性宽厚、好学。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④。章宗继统，“雅爱诸王，置王傅府尉以传导德义”^⑤。宣宗时，山西浑源名士雷渊曾为英王府文学，教授宣宗第二子守纯。有金一代，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对宗室子弟的文化、道德教育。

对待卫亲军的文化教育，始于世宗。金朝皇帝的侍卫绝大多数都是选拔宗室、外戚和勋臣子弟，秩满后迁官较快，有的将直接出任亲民官。为了使他们出职后具备一定的政治领导才能，就必须在任职期间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世宗的教育思想是非常明确的：“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所以规定侍卫亲军也要学习用女真字翻译的儒家典籍。大定二十三年，“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⑥。章宗继承了世宗的传统，即位后诏“其护卫、符宝、奉御、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人为之教授”^⑦。统领亲军的点检司专设教授若干名进行文化教育。泰和年间，“诏亲军三十五岁以下令习《孝经》、《论语》”^⑧。

因而金代中期以后，出身亲军的女真人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和一定的政治才能，如裴满亨、完颜仲德等，后来都考中女真进士。

宫廷内的宫女既有宦门闺秀，又有失去平民身份的宫籍监户之女，她们被限制在皇宫内作各种服务工作。为了使她们熟悉宫廷内礼节法度、提高服务质量，章宗时专门设立了宫廷教官，负责宫女的文化教育，选拔行为规正、学问通达的老成之士为“宫教”。如朱澜，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登科时年已六十，“意气不少衰”，章宗时被选为宫教；蒲城人张建，明昌初以绛州教官召为宫教。时章宗元妃李师儿因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张建教授宫中，师儿与诸宫女皆从之学。宫廷内男女界线极严，宫教授课不能与宫女直接对面，必须用青纱隔其内外，“宫教居障外，诸宫女居障内，不得面见。有不识字及问义，皆自障内映纱指字请问，宫教自障外口说教之”^②。

（二）民间私学

金朝的民间私学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1. 家学承传。一些名门显宦、文学世家，从小就注意对孩子的文化教育，往往是父母兄长亲自督教。如金中期著名文士王庭筠“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③，七岁从父兄学诗，十一岁赋全题；大定十九年状元张行简就是从小在祖商老、父暉的直接教授下成才的；河中名士李献卿兄弟三人皆自小受母亲梁氏的传授；贞祐三年经义状元刘汝翼，“诸子皆传家学”^④。实际上金朝许多名卿士大夫的成才都是和他们深厚的家学渊源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延师执教。一般来说，延师教子弟大都是有地位或比较富有的人家。如同知河间府事张公著“延致名儒课子弟授业”^⑤；

名士杨奂曾“授馆左丞张公信甫（行信）之门”^⑩；南峰先生吕豫，“宗室复兴镇大名，闻先生之名，延致门下”^⑪。

3. 名儒传授。如胡砺得韩昉教授而成名；王若虚是名士周昂外甥，从小师事其舅，昂“督教周至，尽传所学。及官四方，又托之名士刘正甫，使卒业焉”^⑫；元好问为陵川郝天挺的弟子；相州李公度师王庭筠，“工诗及字画，皆得法于黄华”^⑬；金末进士王说、王采苓得名士麻九畴传授而登科，其例不胜枚举。

4. 塾师教诲。最晚自金代中期开始，就普遍出现了专门以教学为职业的私塾教师，入塾学生必须交一定数量的学费。塾师有的是科举不第的读书人，以此谋生。如平阴人王去非，“尝就举，不得第，即屏去，督妻孥耕织以给伏腊。家居教授，束脩有余辄分惠人”^⑭；赵质，大定末应举落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⑮；磁州人曹珏也因科场失意，“居方城二十年，教授为业”^⑯。有的是宦途不显，无意进取，教书度日。如大名人王汝梅，“始由律学为伊阳簿，秩满，遂隐居不仕，性嗜书，动有礼法。生徒以法经就学者，兼授以经学。诸生服其教”^⑰。有的是金末躲避战乱，隐居山村而执教或讲学。如薛继先，“南渡后，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⑱；杜时升，“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⑲。许多隐逸者都是博学之士。

三、金朝教育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金朝是一个以女真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它的政治制度是兼采辽宋之法而损益之，对唐制亦有所继承，又根据多民族政权的特点，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形成了具有一代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教育也不例外。与前代相比，金朝教育有如下特点：

（一）学校学生资格等级森严

金朝的学校教育更明显地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特点。以国子学和女真国子学为例，规定学生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为之。而宋代的国子学，最初“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真宗景德年间，国子生入学资格放宽到“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④；太学，金朝规定四百学生中有一百五十人以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充之，宋代则“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⑤为之；金朝的府州学也明确规定官宦子弟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两相对比，可看出金代官学入学时对象比宋代品级更加严格和高贵，基本近似唐制。显而易见，这种规定为各级官僚子弟的仕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重视小学教育

金朝教育很重视对儿童和少年的早期培养，所以小学特别普及。国子学和女真国子学四百人中就有二百人是小学生，府州学生的最低入学年龄也只限在十三岁。北宋和南宋虽都在京师专设过小学，但教授对象仅限于“宗子”。金代则不然，由于科举专设汉儿经童科和女真经童科，所以客观上更刺激了各级小学和民间小学的发展。经童科选拔的对象是士庶子年十三岁以下。汉儿经童科最多一科取至一百二十二人，一般在五六十人左右。中选后多就读太学考进士，不中进士者按本科规定除官。朔州人李完“八岁中神童（即经童）科，总角第进士”^⑥。女真人蒲察元衡，“使应童子举，十一登科，移籍太学，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论进士”^⑦。许多士家和平民子弟很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为后来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民间教育比辽宋更为发达

金朝的民间私学自始至终都比较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辽、宋的民间私学教育基础较好，金朝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金朝科举选士不限于正规学校，受教于父兄、师友、自学成材的人也可通过科举而入仕，刺激了民间私学的发展。大司农丞康锡幼孤，养于外祖田氏家，“及长，师柏乡王翰周辅，束脩不能备，周辅与诸生共赙给之，中崇庆二年进士弟”^④。可见当时除了初、中级私学外，还有相当于大学程度的私塾。由于科举为寒士提供了仕进的阶梯，所以民间教育也和地方官学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私人讲学授教之风也很盛行，对人才的成长，私学和官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元好问认为文士成名“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⑤。国家从上到下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地方学校教育的普及，使民间私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⑥。足见民间教育之盛，学风之醇厚。

(四) 汉儿、女真分别设学是金代教育尤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辽和金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封建政权，契丹和女真族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分别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但辽代却没有为契丹学专门创设教育机构和完整的教育体系，金朝从上到下创设了女真学校，并为女真族专设女真进士科和女真经童科，注意对本民族优秀人才的培养教育和选拔，使女真学取得了与汉学同等的地位。

(五) 各民族文化大交融是金朝教育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金朝教育从形式上看分为汉儿和女真两套体系，实际上教学内容基本相同，女真学校教授的也是儒家经典，只不过保留了女